

論清一代對疆土版圖觀念的嬗變

鄒逸麟*

一，清代大一統疆域的形成

17世紀中葉，統治了中國276年的明朝，為興起於遼東女真族所建立的清朝所滅，中華帝國的疆域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清代統一疆域的形成，有一個相當曲折和漫長的歷史過程。從1583年明遼東建州女真努爾哈赤發難，先統一了東北女真諸部，後又佔據了明代遼東都司故地，1644年進山海關推翻明朝，1683年平定臺灣，據有明朝全部故土，前後整整化了100年的時間。在此期間，清朝對蒙古地區推行“遠交近攻”之策，以“厚賞”、“聯姻”並雜以武力方式，完成了對漠南蒙古諸部的統一。1688年漠北外喀爾喀蒙古舉旗投清，外蒙古進入版圖。中國歷史上除了蒙元朝，蒙古高原從未真正與中原王朝統一在一個政權之下，內外蒙古進入清朝版圖，確為曠古未有之盛事。其後雍正論及國家統一時指出：“歷代以來，各蒙古自為雄長，亦互相戰爭。至元太祖之世，始成一統，歷前明二百餘年，我太祖皇帝開基東土，遐邇率服，而各蒙古又復望風歸順，咸稟正朔，以迄於今。是中國之一統始於秦氏，而塞外之一統始於元代，而極盛於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員極廣，未有如我朝者也。然各蒙古之所以統一者，亦皆天時人事之自然，豈人力所能強乎？”¹⁾

然康熙以來，西北尚有強大的準噶爾部未入版圖，其所控地跨蔥嶺東西、天山南北，東抵哈密，西及中亞，疆土之廣，不下於中原；又勾結沙俄，覬覦中華。後由康、雍、乾三朝，經歷大小多次戰役，歷時數十餘年，終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二十四年先後征服準噶爾和平定天山南路大小和卓木，將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的廣大西北疆域收入版圖。同時順、康年間先後冊封達賴、班禪額爾德尼，賜以冊印。後又擊退準噶爾入藏軍，西藏遂入版圖。清王朝的疆域達到了中國歷史上空前遼闊的範圍。史稱“自茲以來，東極三姓所屬庫頁島，西極新疆疏勒至於蔥嶺，北極外興安嶺，南極廣東瓊州之崖山，莫不稽顙內鄉，誠系本朝。”²⁾

我國歷史上疆域的變遷，與地理環境有關。我國地處亞洲的東部，北面是蒙古高原的茫茫大漠，向東延伸為外興安嶺，西北為阿爾泰山，西面為帕米爾高原，西南為青藏高原，東部和東南

*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教授

1) 《雍正起居注》雍正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中華書局影印，第四冊，2910頁。

2) 《清史稿》卷54《地理志一》。

部面臨大海。在這樣四周封閉的地理環境下，決定了我國歷史上疆域的拓展、內縮，基本上在這個範圍之內。同時，由於地域遼闊（東西跨62經度，南北跨50緯度），不同的氣候和地貌條件，在此範圍內形成了東亞季風區、西北乾旱半乾旱區和青藏高原區等三大自然地理區。這三大自然區內的先民們，根據自身所處的特定地理環境，逐漸形成了從事農耕、畜牧、採集和狩獵等三大經濟區。在大漠以南、青藏高原以東的東亞季風地區，自新石器時代以來，最早進入農業文明社會，從商周以降，農業生產逐漸占主要地位，到了西元前221年秦統一國家疆域的形成，基本上包含了所有農耕區。換言之，我國最早統一國家疆域的形成是建立在同一農業文明基礎之上的。所以秦漢以後，歷代漢族王朝的疆域概念，主要是指其統治下的農耕區，以後中原王朝疆域的伸縮變化，主要是在與北部乾旱和半乾旱區遊牧民族（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契丹、蒙古）之間，爲了爭奪生存空間和人口、物資而發生的。八、九世紀以後，原處於比較落後高寒區的狩獵、採集經濟的民族，逐漸發展爲以遊耕、狩獵爲主，政治上也出現了部落聯盟或國家政權的形式（渤海、女真、吐蕃），於是開始與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發生了土地、資源和人口的爭奪。概言之，清代中葉以前我國歷史上疆域變化，實質上是由三大自然區決定的三大經濟區之間的交融與爭鬥的表現。

清代前期統一帝國的形，是將二千年來，形成的農耕、畜牧、狩獵採集三大經濟區融合在一個政權之內，是三大經濟區的民族在長期相互交流、融合的自然結果。此後對三大經濟區的協調，完全可以通過政治手段，而不是軍事手段，從而大大減少了對社會經濟的破壞性，爲各經濟區的發展，人民生活的安定，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二、清代及其以前傳統的疆土、版圖觀念

在我國傳統中國社會裏，歷代中原王朝統治者認爲他們所統治的核心地區是所謂“九州”，爲天下之中。“九州”之外有甸、侯、綏、要、荒等五服，五服之外，爲四海，即蠻夷之地。古人心目中，其直接統治農耕區是爲中國本土，其周圍四夷均爲臣屬之地，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³⁾宋人石介《中國論》代表了典型的傳統中國觀，他說：“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⁴⁾古代王朝所謂守禦疆土的主要任務，是保護好所統治的農耕區，就是本土。其周圍爲臣服的四夷，四夷的經濟、文化遠落後于中原，只是臣服朝貢關係，無須有明確的界域，因此當時沒有明確的國界線的概念。雖然在歷史上曾經有過唐蕃、宋遼、宋金的劃界，但實際只是一種臨時的軍事分界線，在沒有對立民族或政權

3)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其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所以後人發揮爲“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則諸蕃雖地有遠近，情有逆順，正朔有及不及，而凡我行人輒跡曾至者，皆因事備書，以昭國家一統之盛。”（《殊域周咨錄》卷一）

4) 載陳植鐸點校《徂徠石先生文集》116頁，中華書局，1984年。

的邊區，就沒有產生過這種界線。因此這種界線與現代國家的邊界線含義不同。

今天大家公認的表示國家疆域領土的“版圖”一詞，在我國傳統社會裏主要指中央王朝派官直接控制和治理的人口和土地。《周禮·夏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清史稿》卷283《何國宗傳》論曰：“國家有疆宇，謂之版圖。版言乎其有民，圖言乎其有地。”版，即版籍，人口統計數字；圖即所據有土地的地圖。我國數千年傳統社會是以農業為基礎的社會，土地和人口（勞力），就是國家統治的基礎。所以“版圖”一詞，就是指王朝直接派官治理，所控制的人口和土地，並據此按規定征納賦稅和勞（兵）役。但在我國數千年傳統社會裏，中央王朝所統治領土內的情況非常複雜，有的是朝廷直接控制的人口和土地，有的則是通過邊區少數民族首領控制的羈縻地區。因此，歷史文獻中所謂“版圖”，往往包有上述兩層意思，沒有嚴格限定為今日國家版圖的含義。在統治集團的心目中，前一種含義才是他們最為關注的“版圖”。例如，漢武帝西逐匈奴，控制了西域之地，置有西域都護府，但在《漢書地理志》裏只記農耕區的103郡國。唐朝盛時，平突厥，西北諸蕃及蠻夷均已內屬，但在其地置羈縻都督府州，以其部落首領為都督、刺史，皆得世襲。“雖貢賦版籍，多不上戶部，然聲教所暨，皆邊州都督、都護所領。”⁵⁾就是對中原農耕地區以外周邊少數民族地區採取羈縻的統治方式，即對中央不納賦稅，不服勞役，與內地農耕區不同。到了明代，“即使在中國的統治已經推到長城以外，並設置戍軍以支援的時候，其目的也是不對外發展，而是一種防禦性佔領，以填充可能被用來攻擊中國邊界的缺口。”⁶⁾

清代康、雍、乾三朝大統一帝國疆域的最後形成，使清代統治者面對的是空前遼闊的疆域，擴大了的邊疆的視野。歷史上中原王朝的北邊長城已經失去了國防的意義，不過是一條天然農牧分界線而已。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巡幸喀爾喀蒙古地時，躊躇滿志地對扈從諸臣說：“昔秦土石之功，修築長城，我朝施恩於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長城更為堅固。”⁷⁾由此可見，清代前期統治者對疆土的視野遠遠超過了以往歷朝歷代。但是數千年來形成“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的觀念並未完全退出歷史舞臺，這可以從清代統治者對其領土的管理和對“版圖”的觀念中反映出來。

清廷統一以後，對轄下廣大領土的不同地區，採取不同的統治方式和行政體制，大體上分為三種類型：（一）直省，即內地十八省，為明代故土，是傳統的農耕區，清初仍沿明制，採取兩京十三布政使司制度，不過改南京為江南，初為十五省，後有所析置。至乾隆中葉定為內地十八省（直隸、江蘇、安徽、山西、山東、陝西、甘肅、河南、江西、浙江、四川、湖南、湖北、福建、廣東、廣西、貴州、雲南），成為定制。（二）藩部。指邊疆部落地區，包括極東北大小安嶺

5) 《新唐書》卷43下《地理志七下》羈縻州。

6) [美]拉鐵摩爾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241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7) 《清聖祖實錄》卷151，康熙三十年四月壬辰，“論扈從諸臣曰：昔秦土石之功，修築長城，我朝施恩於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長城更為堅固。”（中華書局影印本，第5冊，677頁）

地區的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等原始狩獵部落，清代泛稱“打牲部落”，還有內外蒙古、回部和西藏，屬中央理藩院管轄。範圍東自黑龍江、松花江，北盡喀爾喀，南以長城為界，西北包括整個新疆和青藏高原，西南直至川滇邊區。⁸⁾ 各地區的統治模式雖所有不同，但都是清王朝的直屬領土。⁹⁾ (三) 滿洲發祥地東北地區，採取以軍政為主、州縣為輔的特別行政體制。由於清代疆域空前廣大，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不同自然條件的差異很大。清王朝採取不同行政統治方法是符合實際的。

但是，滿洲政權是從一個相對落後的遊耕、狩獵民族，經過一百多年的錘煉，最後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將農耕、遊牧、採集狩獵三個不同地區、民族統一在一個政權之下的龐大帝國，面對是完全新的政治局面，對帝國的統治者來說，一方面是要以新的理念來統治遼闊的疆土，一方面還沒有完全脫離中國固有傳統的國家理念，因此對現代國家政治意義上的疆土、疆域、領土、版圖等概念的理解，開始是很不清楚的，甚至是模糊的。

例如藩部各地，在清一代大部分時間屬崇德三年（1638年）成立的中央理藩院管轄，但理藩院還統轄外藩屬國，如俄羅斯事務亦由理藩院柔遠司管理，當時清廷也將俄羅斯視為“北蕃”，¹⁰⁾ 這裏就有中外分別不清之弊，這種模糊的中外關係，實出於清人對藩部的看法還是傳統的“王者守四夷”觀念，¹¹⁾ 對周邊四夷主要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曠然更始而不驚，靡然向風而自化。”¹²⁾ 還離不開傳統的文化疆域的概念。直至咸豐十年（1860年）理藩院掌管的外交事務，才劃歸總理衙門管理。

又如，中國傳統社會裏，將農業文明和儒家文化地區視為本土，而此外則視為化外之地。帝國的君主認為只要這些化外的“蠻夷”恭順臣服，按時納貢，為中國守四方，就無須有明確的邊界線。所謂：“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臨，無有遠邇，一視同仁，故中國奠安，四夷所得，非有意於臣服之也。”¹³⁾ 進入清代，這種觀念仍舊，如清初入關佔有明朝故土，概謂之“新入版圖”，¹⁴⁾ 並謂“目今廣輿大勢，漸次盡入版圖。”¹⁵⁾ 但又有將原已進入中央王朝統治領域內的少數民

8) 張永江《清代藩部研究》102頁，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9) 詳見張永江《清代藩部研究》第四章藩部政治體制構造的基本原則與行政模式（一）、第五章藩部政治體制構造的基本原則與行政模式（二）

10) 龔自珍《主客司述略》：“我朝藩服分二類：其朝貢之事，有隸理藩院者，有隸主客司者。其隸理藩院者，蒙古五十一旗，喀爾喀八十二旗，以及西藏、青海，西藏所屬之廓爾喀是也。隸主客司者，曰朝鮮，曰越南，曰南掌，曰緬甸，曰蘇祿，曰暹羅，曰荷蘭，曰琉球，曰西洋諸國。……自朝鮮以至琉球，貢有額有朝，朝有期；西洋諸國，貢無定額，無定期。”（《龔自珍全集》第一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118頁）

11) [清] 昭槤《嘯亭雜錄》卷10《理藩院》：“北人，自秦漢後匈奴、突厥、遼、回、蒙古，漢唐主不能與抗，乃至和親納幣，含垢忍辱，以求旦夕之安，而寇警邊烽，又環然至矣。至若本朝，威德偉然，氈廬月窟之長，無不匍匐庭除，爭為臣僕。故列聖土封之，世為畀守，作我藩服，朝聘宴享，比靈斯三代，王者守四夷如是也。豈漢唐孱弱之主所能及也。”（何英芳點校本，336頁，中華書局1980年版）

12) 李兆洛《皇朝藩部要略》序。

13) 《殊域周知錄》卷四《琉球》，余思黎點校本，125頁，中華書局1993年版。

14) 《清世祖實錄》卷17，順治二年六月己卯：“江南既入版圖，天下一統。”（中華書局影印本，第3冊，157頁）

15) 《清世祖實錄》卷34，順治四年十月戊子。（中華書局影印本，第3冊，282頁）

族首領管理的土司地區，在改土歸流後，才說成是“新入版圖”，同時在清代還進一步強調對新進入版圖的少數民族進行儒家文化的教育。¹⁶⁾所以當時內外之分，主要是指是否屬於農耕文明和儒家文化圈，如雲南、廣西明明是邊疆地區，卻被說成是內地十八省。可見當時所謂“版圖”，實質就是指王朝在政治、經濟和文化能直接控制的地區，並非專指其所統治的所有疆土。

又如，專指今新疆地區的“新疆”一詞，出現於乾隆平定天山南北以後，當時尚未成爲正式固定的政區名稱，有時或稱西域、有時專指天山以南回部。正式成爲政區名，實在新疆建省以後。但在此前，“新疆”一詞在康、雍年間已經出現，並非指今新疆，而是對貴州、雲南、湖南、四川等改土歸流後的地區稱“新疆”，如《清實錄》中有“東川、普洱等處半系新疆”，貴州的“古州新疆”，湖南“苗疆如辰州府屬之乾州、鳳凰、永綏三廳……寶慶府之長安廳，俱系新疆”，“兩金川蕩平，新疆事件悉由松茂道查辦核轉。”這些地區清初早已列入版圖，爲何此時又稱新疆？根據史實，實系改土歸流後，中央新置官設治的疆土。¹⁷⁾所以清代前期的疆土、版圖概念與近代民族國家的疆土、版圖概念有所不同。

16) 《清世祖實錄》卷5，順治元年五月己亥：“若二省（指山東、山西）兵民歸我版圖，則財富有出，國用不匱矣。”（中華書局影印本，第3冊，58頁）《清聖祖實錄》卷155，康熙三十一年五月癸酉，“廣東廣西總督石琳疏言：黎人地方丁田無多，不便設立州縣。總兵官吳啓爵所奏于黎人地方築建城垣，添設官兵之處，應無庸議。上曰：閩瓊州輿圖，周圍皆服內州縣，而黎人居中，如果此處應取，古人何爲將其周圍取之，而在內彈丸之地，反而棄而不取乎。不入版圖，必有深意。創立州縣，建築城垣，有累百姓。部議不准，良是。”（中華書局影印本，第5冊，713頁）《清世宗實錄》卷63，雍正五年十一月戊辰，“雲貴總督鄂爾泰疏言：黔省邊界生苗，不納糧賦，不受管轄，隨其自便，無所不爲，由來已久。……今仰賴聖主聖教所訖，莫不願附版圖，但戶口必須編造，錢糧自應從輕。且夷名半無姓氏，名字雷同。應行更改姓名，匯冊報部，酌爲額賦，按年輸租，庶幾邊境長寧，夷民永賴。”（中華書局影印本，第7冊，968頁）同書卷67，雍正六年三月“庚辰，雲貴總督鄂爾泰疏報，化導生苗木林工乜等一百一十五寨，輸誠納賦，附載版圖。”（中華書局影印本，第7冊，1031頁）同書卷101，雍正八年十二月庚戌，“四川巡撫憲德疏言：茂州羌民，久列版圖，載糧入冊，與齊民無異。請照例與漢民一體應試，科舉出貢。卷面不必分別漢羌額數，憑文去取，以廣樂育鼓勵之意。應如所請，從之。”（中華書局影印本，第8冊，339頁）《清高宗實錄》卷61，乾隆三年正月乙亥：“命湖北改土歸流之縣，貢賦悉照原額。……其餘改土地方，新入版圖者，該督撫現在查勘，分別升科。”（中華書局影印本，第10冊，8頁）同時對新入版圖的番民，進行儒家文化教育，參加科舉考試。同書卷264，乾隆十一年四月庚午，“番民既入版圖，即與編氓無異，應於該寨適中之地，設立講約所，該州暨儒學等官。朔望輪往，傳集番民，宣講《聖諭廣訓》，及整飭地方利弊文告。並於律例中，擇其易犯之條，翻譯講解，曉諭化導。其子弟秀異可讀書者，送州義學肄業。果能漸通文理。照土司苗獠子弟應試之例，准其考試。”（中華書局影印本，第12冊，420頁）《清高宗實錄》卷315，乾隆十三年五月戊申：“至百夷及川廣雲貴各省土司，今既改置府州或仍設土官，皆隸版圖。”（中華書局影印本，第13冊，178頁）《清高宗實錄》卷333，乾隆十四年正月戊辰，在平定大小金川前，諭曰：“金川地勢，詰屈幽深，其眾如鼠伏穴中，節久糧費，民力艱難。上綦聖慮，即掃穴犁庭，而地不足以入版圖，人不足供賦役，於天朝無所加益。”（中華書局影印本，第13冊，569頁）

17) 傅林祥《新疆與舊轄——清代“新疆”一詞的含義》，未刊稿。

三，清一代疆土、版圖理念的嬗變

17世紀中葉以前，歐亞各國尚無明確的“領土”、“邊界”的概念，17世紀中葉以後，隨著各國疆域的開拓，相互接觸以後，才開始發生邊界的交涉。當時代表中國的清帝國，在康熙時，除了西北的準噶爾部以外，周圍幾乎沒有能與清帝國抗衡任何民族或政權。乾隆平定西北後，疆域進一步擴大，自豪地認為“天朝所管地方，至為廣遠”，“天朝撫有四海”，¹⁸⁾傳統的“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觀念，仍占主導地位。但是在以後的年代裏，隨著國內外和世界形勢的變化，帝國朝野對版圖、疆域、邊界等概念隨著時代的發展，也逐漸發生了變化。

這種變化是有內外兩方面因素促成的。

內因是：經過康、雍、乾三代的經營，政治上採取高壓與懷柔相濟的政策，經濟上獎勵發展農業生產，注意百姓生計，社會相對穩定，邊區民族融入統一帝國後，內地與邊區的交往日益密切，農耕文化和儒家文明地域的擴大，華夷之限的界線逐漸模糊，邊疆、內地“一體化”進程加速，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觀念進一步深入人心，華夷之別，逐漸為中外之別所替代。同時清朝統治階級因是異族入居中原，務須消除“華夷”之別，以證其統治的合法性。康熙帝即強調：“中外同觀，罔有殊別。”¹⁹⁾如針對清初漢族士大夫的華夷觀，雍正七年九月諭文武大臣：“徒謂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為中國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為誣謗詆譏之說耳。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非以其為戎狄而外之也。……且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獯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在今日而目為夷狄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為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並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²⁰⁾清王朝自認為是多民族統一國家，其國家公文多以漢、滿、蒙、藏多種文字頒佈，即其明證。特別是到了乾隆中期全國疆域的奠定，至少在朝廷高層次人員中，多民族大一統國家的意識已經形成。其時對疆土、版圖的認定，已經不限於傳統的版和圖了。如外蒙歸附後，康熙諭曰：“朕承繼大統，數十年來，擴從古未入版圖之疆宇，服從古未經歸附之喀爾喀、厄魯特等。”²¹⁾乾隆時平準噶爾後云：“現今準噶爾盡入版圖，其北則俄羅斯境地。”²²⁾乾隆二十三年五月己丑，“諭曰：準噶爾‘今既歸我版圖，即應收其賦稅。如有採買，祇當給與平價，不可與外藩交易一例。’”²³⁾二十四年平回部後，諭曰：“今統計用兵，不越五載，內地初不知有徵發之

18) 《清高宗實錄》卷1435，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中華書局影印本，第27冊，185頁)

19) 《清聖祖實錄》卷151，康熙三十年五月戊子。(中華書局影印本，第5冊，674頁)

20) 《清世宗實錄》卷86，雍正七年九月癸未。(中華書局影印本，第8冊，147-149頁)

21) 《清聖祖實錄》卷234，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壬午。(中華書局影印本，第6冊，338頁)

22) 《清高宗實錄》卷519，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壬子。(中華書局影印本，第15冊，547頁)

23) 《清高宗實錄》卷562，乾隆二十三年五月己丑。(中華書局影印本，第16冊，126頁)

勞，而關門以西，萬有餘裏，悉入版圖。如左右哈薩克、東西布魯特及回部各城，以次撫定。現在巴達克山諸部落，皆知獻俘，自效捧檄前驅。以亙古不通中國之地，悉為我大清臣僕，稽之往牒，實為未有之盛事。”²⁴⁾ 康、雍、乾三朝在蒙古、新疆地區邊界上鄂博、卡倫的設置和定期的巡邊制度，反映了清代邊界意識的加強。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馬戛爾尼使團來華，要求在天津、寧波等港口泊船貿易，乾隆答曰：“天朝疆界分明，從不許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攙雜。……天朝尺土俱歸版圖，疆址森然，即島嶼沙洲亦必劃界分疆，各有專屬。”²⁵⁾ 這固然是封閉鎖國落後政策，但這裏明顯反映了強烈的國家版圖的意識。

這一種大一統版圖意識，還反映在康、乾、嘉三朝《大清一統志》的修撰。中國有撰寫全國總志的傳統，至少從隋代開始，反映全國疆域、政區、山川、戶口、物產、古跡等等的全國總志已經出現，其目的是為統治者提供疆土情況，以便治理，同時也有炫耀盛世之意。元代以來即名“一統志”。清康熙在平定“三藩”、統一臺灣之後，於康熙二十五年（1672年）開始編撰《大清一統志》，修志目的，康熙諭《一統志》總裁勒德洪等云：“朕纘紹丕基，撫茲方夏，恢我土宇，達于遐方。惟是疆域紛錯，幅員遼闊，萬里之遠，念切堂階。其間風氣群分，民情類別，不有綴錄，何以周知？顧由漢以來，方輿地理，作者頗多，詳略既殊。今昔互異，爰敕所司，肇開館局，網羅文獻，質訂圖經，將薈萃成書，以著一代之巨典，名曰大清一統志。特命卿等為總裁官，其董率纂修官，恪勤乃事，務求采搜閱博，體例精詳。阨塞山川，風土人物，指掌可治，畫地成圖。萬幾之餘，朕將親覽。”²⁶⁾ 顯然是為了炫耀清代疆域之盛。“康熙志”成於乾隆五年（1740年）。這一年十一月甲午，乾隆作序文：“聖祖仁皇帝特合纂全書，以昭大一統之盛大，卷帙繁重，久而未成。世宗憲法皇帝御極之初，重加編纂。閱今十有餘載，次第告成。自京畿達於四裔，為省十有八，統府州縣千六百有奇，外藩屬國五十有七，朝貢之國三十有一。……書成，凡三百五十餘卷。……書曰：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²⁷⁾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因新疆內屬，又重修《一統志》，“將西域新疆，增入《一統志》。”²⁸⁾ 完成於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然因其後又有二次平定大小金川之役、兩次廓爾喀之役，疆域尚未不穩定。於是嘉慶十六年（1811年）開始第三次纂修《一統志》，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完成，歷時34年，資料以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為斷，故定名為《嘉慶重修清一統志》。嘉慶志在邊疆統部範圍、門類、轄境、邊界等方面，大大超過《康熙志》、《乾隆志》，並附有反映全國疆域的“嘉慶大清一統輿圖”，其範圍“東盡費雅喀，西極蔥嶺，北界俄羅斯，南至南海。”²⁹⁾ 為《康熙志》、《乾隆志》所未有，故“其品質明顯高於前二者。公認該志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完備、品質最好的一部地理總志。”“所以‘嘉

24) 《清高宗實錄》卷599，乾隆二十四年十月辛丑。（中華書局影印本，第16冊，703頁）

25) 《清高宗實錄》卷1435，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中華書局影印本，第27冊，186頁）

26) 《清聖祖實錄》卷126，康熙二十五年五月庚寅。（中華書局影印本，第5冊，342-343頁）

27) 《清高宗實錄》卷131，乾隆五年十一月甲午，（中華書局影印本，第10冊，914頁）

28) 《清高宗實錄》卷722，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朔。（中華書局影印本，第17冊，1044頁）

29) 李兆洛《皇朝一統輿地全圖·例言》，《養一齋文集》卷19，引自《清人文集地理類彙編》第1冊，321頁

慶志’所輯資料終斷之年（1820），當是中國疆域最終奠定的時間座標。”³⁰⁾

外因是：與西方政治勢力和文化接觸後，開始加強了自我認同的意識，近代民族國家的意識逐漸產生。這種變化，大體上有幾個契機：

（一）中俄《尼布楚條約》、《恰克圖條約》的簽訂，大大衝擊了傳統的疆土觀念。原先清廷對北方邊疆的疆界沒有十分地關注。因為那兒居住的是臣服了多年的打牲部落，按時貢賦，邊境安定。17世紀中葉，俄國人開始入侵黑龍江地區，並建立了尼布楚、雅克薩等許多據點，對清朝邊境發動了挑戰，刺激了清王朝邊界概念的生成。但那時內地南明未平、後又有“三藩之亂”（1673-1680），清廷還無暇顧及北邊。1681年平定“三藩”後，開始對黑龍江地區的俄國人採取軍事行動，以後經過1685、1686年兩次雅克薩戰爭，大敗俄軍，但清廷還是希望和平解決邊界爭端，康熙二十五年（1687年）乘荷蘭使團回國之際，委託荷蘭使團帶信給沙皇，要求“收回雅克薩、尼布潮、羅刹，於何處分立疆界，各毋得逾越，則兩界人民，均得安居，不失永相和好之意。”³¹⁾當1688年以索額圖為首的第一次中國談判使團出發前夕，康熙即指示：“朕以為尼布潮、雅克薩、黑龍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屬之地，不可少棄之于鄂羅斯。”³²⁾但是在談判時，康熙為了求得北邊安寧，在條約上作了讓步。同意尼布楚歸俄，以額爾古納河界。³³⁾這條約在穩定東北部邊境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康熙“對於談判的成功深為快慰。”³⁴⁾對協助談判的葡萄牙教士徐日升、法國教士張誠的工作，“覺得事情辦得很好，很為滿意。”³⁵⁾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按照國際法的規則與外國訂立平等互惠的邊界條約，確定了中俄東段邊界。在《尼布楚條約》裏，“清朝”和“中國”已經互稱，這時“中國”一詞已有近代主權國家的意義。雍正五年（1727年）簽訂的《恰克圖條約》³⁶⁾，確定了中俄中段邊界。這兩個條約的簽訂，對清朝統治者傳統的邊疆觀念產生了重大的衝擊，使清朝統治者明白了一國疆土必須有明確的界線，而傳統王朝對所轄領土邊疆認識的“天下”觀，已經完全不適應當代的形勢了。於是康熙帝萌發繪製帝國疆域地圖的念頭，對邊境國界格外

30) 於逢春《論中國疆域最終奠定的時空座標》，《清史研究》第16卷第1期，2006年3月。

31) 《清聖祖實錄》卷127，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己酉。（中華書局影印本，第5冊，355頁）

32) 《清聖祖實錄》卷135，康熙二十七年五月二月癸酉，（中華書局影印本，第5冊，466頁）

33) 《清聖祖實錄》卷140，康熙二十八年三月壬辰，“鄂羅斯斯遣使臣費要多羅等至尼布潮地方請議分界事宜。上復遣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等赴尼布潮就議。索額圖奏言：尼布潮、雅克薩既系我屬所居地，臣等請如前議以尼布潮為界，此內諸地，皆歸我朝。上曰：今年內以尼布潮為界，則鄂羅斯遣使貿易，無棲托之所，勢難相通。爾等初議時仍以尼布潮為界，彼使者若懇求尼布潮，可即以額爾古納河界。”（中華書局影印本，第5冊，543頁）

34) [法]張誠著 陳霞飛譯：《張誠日記》（1689年10月12日），58頁，商務印書館，1973年版。

35) 王立人譯：《徐日升神甫的日記》第62節，商務印書館，1973年版，第214頁。

36) 《清世宗實錄》卷60，雍正五年八月乙巳，與俄羅斯，“以博木、沙畢鼎嶺為界。定界之後，不得混雜居住，……與俄羅斯副使一番一番諾費池等指定東西界址，議立界石。……立定界石。曉諭喀爾喀汗王、各紮薩克、黑龍江將軍等，令其約束屬人，不得越界生事，違者從重治罪。至恰克圖口定為貿易之所。”（中華書局影印本，第7冊，921頁）

注意。例如專門勘察和繪製中朝邊界圖等。³⁷⁾自後清王朝統治者，對國土、邊界以及屬民的概念，與前發生重大變化。

（二）16世紀西洋耶穌會傳教士在地理大發現背景下，帶來的地理學知識，對中國固有的天下、中國、疆土的觀念，產生了極大的衝擊。晚明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艾儒略《職方外紀》以及清初南懷仁《坤輿全圖》的傳入，使一部分中國士大夫階級知道了地球、五大洲，知道世界上還有這麼多文明高度的國家，而中國只是亞洲東部的一塊，僅占地球的八十分之一，終於明白了國與國之間存在的真正區別，拋棄了外國人都歸於蠻夷的錯誤看法。³⁸⁾這就為中國知識界打開了認識世界的大門，令他們開始有了“世界意識”，並刺激他們想瞭解中國在地球上的位置，包括它的疆域和領土範圍。當時西方各國也開始繪製地圖，以證明其國家的領土範圍。清王朝康熙帝對西方自然科學很有興趣，他身邊有一批耶穌會傳教士，如南懷仁、徐日升、張誠等，康熙即跟隨他們學數學、天文學、曆學、物理學等，還對地理學更是有興趣，自謂“朕於地理從幼留心。”³⁹⁾以後由於《尼布楚條約》的簽訂，“這種新出現的條約關係必然使康熙帝以往的疆域觀念受到極大衝擊，從而渴望對清朝的版圖有一個新的更全面的瞭解，耶穌會士在中俄談判中的突出表現，使得他像信任西方曆法一樣開始重視而不見他們的製圖學。”⁴⁰⁾於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正式開始，在耶穌會傳教士協助下，於五十七年（1718年）完成了經過實測經緯度基礎上繪製的《皇輿全覽圖》。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二月乙卯詔諭：“《皇輿全覽圖》，朕費三十餘年心力，始得告成。……從來輿圖所未有也。……東南東北，皆際海為界，西南西北，直達番回諸部，以至瑤池阿耨絕域之國、黃流黑水發源之地，皆琛贐所賓貢，版輿所隸屬。舉其土壤，驚為創見之名。溯厥道途，即可按程而至。以六合為疆索，以八方為門戶，幅員該廣，靡遠費屈，從來輿圖所未有也。”⁴¹⁾當時中國尚未統一，所以康熙圖所示疆域，西僅至哈密。雍正十排圖，基本上維持

37) 《清聖祖實錄》卷246，康熙五十年四月癸巳，“自古以來，繪輿圖者，俱不依照天上之度數，以推算地理之遠近，故差誤者多。朕前特遣能算善畫之人，將東北一帶山川地理，俱照天上度數推算，詳加繪圖視之。混同江自長白山後流出，由船廠打牲烏喇向東北流，會於黑龍江入海。此皆系中國地方。鴨綠江自長白山東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鳳凰城、朝鮮國義州兩間，流入於海。鴨綠江之西北，系中國地方。江之東南，系朝鮮地方。以江為界。土門江自長白山東流出，向東南流入於海。土門江西南，系朝鮮地方，江之東北，系中國地方。亦以江為界。此處俱已明白。但鴨綠江、土門江二江之間地方，知之不明。前遣部員二人往鳳凰城會審朝鮮人李玩枝事，又派出打牲烏喇總管穆克登同往，伊等請訓旨時，朕曾密諭雲：爾等此去並可查看地方，同朝鮮官沿江而上，如中國所屬地方可行，即同朝鮮字在中國地方行；如中國所屬地方，有阻隔不通處，爾等俱在朝鮮所屬地方行。乘此便至極盡處，詳加閱視，務將邊界查明來奏。”（中華書局影印本，第6冊，441頁）

38) 鄒振環《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43、45、4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39) 《清聖祖實錄》卷290，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諭大學士、學士、九卿等，朕於地理從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號，無論邊徼遐荒，必詳考圖籍，廣詢方言，務得其正。故遣使臣至崑崙西番諸處，凡大江、黃河、黑水、金沙、瀾滄諸水發源之地，皆目擊詳求，載入輿圖。今大兵得藏邊外諸蕃悉心歸化，三藏阿裏之地俱入版圖，其山川名號，番漢異同，當於此時考證明核，庶幾可傳信於後。”（中華書局影印本，第6冊，819頁）”

40) 孫喆《康雍乾隆時期輿圖繪製與疆域形成研究》，31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41) 《清聖祖實錄》卷283，康熙五十八年二月乙卯。（中華書局影印本，第6冊，765頁）

康熙圖的規模。到了乾隆二十年五月，“西師奏凱，大兵直抵伊犁，準噶爾諸部，盡入版圖。其星辰分野，日月出入，晝夜節氣時刻，宜載入時憲書，頒賜正朔。其山川道里，應詳細相度，載入《皇輿全圖》，以昭中外一統之盛。左都御史何國宗，素諳測量，著帶同五官正明安圖，並同副都統富德、帶西洋人二名，前往各該處，測其北極高度，東西偏度，及一切形勝，悉心考訂，繪圖呈覽。所有坤輿全圖，及應需儀器，俱著酌量帶往。”⁴²⁾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據新平定西域實測資料，繪製了《皇朝西域圖志》，又據此補充修訂了《康熙圖》，繪製成《乾隆內府輿圖》（又稱乾隆十三排圖）。朱希祖《乾隆十三排圖》影印本序云：“乾隆輿圖之所以勝於《康熙輿圖》者，其精彩全在准部、回部即今新疆省及其迤西小部分是也。”有學者認為：“乾隆《內府輿圖》不僅是一幅歷來被認為是奠定了今天疆域版圖基礎的中國全圖，同時也是當時世界上最早的、最完整的亞洲大陸全圖，其覆蓋面積遠遠超過《康熙圖》。”⁴³⁾ 但是無論《康熙圖》還是《乾隆圖》，在兩個條約處標有界碑，卻都沒有標出明確的全部國界。到了《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時所附《皇朝一統輿圖》則標出了“盛清疆界：北到外興安嶺，西到帕米爾和後藏的阿里地區，東到庫頁島，南到南海。就疆域研究而言，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這是近代民族國家的標誌性要素中國生成的寫照。”“嘉慶圖之登場，既是康熙圖、乾隆圖纂修思想的深化與成果的自然延伸，更意味著中國疆域最終形成的空間最終奠定，而且這空間已非中國傳統想像的‘天下’，因為這空間的點、面、線已由清帝國軍人、官吏、民眾與城池、村鎮所填充。換言之，這最終奠定的空間已轉變成為與毗鄰國家（或地區）有著清晰界限的領土。所以‘嘉慶圖’所標示的盛清疆域與疆界，當是中國疆域最終奠定的空間座標。”⁴⁴⁾

（三）清代中葉以來，有兩股學術潮流影響了中國士大夫階層對疆土、版圖的認識：一是清中葉開始，延續至晚清的邊疆史地之學。梁啟超說：“邊徼地理學之興，蓋緣滿洲崛起東北，入主中原。康乾兩朝，用兵西陲，辟地萬里。幅員式廓，既感周知之必需，交通頻繁，復覺研求之有借。故東自關外三省，北自內外蒙古，西自青海、新疆、衛藏，漸為學者興味所集，域外地理學之興，自晚明西土東來，始知‘九州之外復有九州’。而竺古者猶疑其誕。海禁大開，交涉多故，漸感于彼知己之不可以己，於是談贏之客，頗出於士大夫間矣。蓋道光中葉以後，地理學之趨向一變，其重心蓋由古而今，由內而趨外。”⁴⁵⁾ 這是說清代中葉開海禁以來，開始與西方接觸過程中，有感於對自己國家朦朧無知，一部分有識之士對地理學的研究，“由古而今，由內而趨外。”當時不少邊疆史地的著作問世，松筠《西招圖略》、《西陲總統事略》、洪亮吉《伊犁日記》、祁韻士《新疆識略》、《藩部要略》、徐松《西域水道記》、張穆《蒙古遊牧記》、龔自珍《蒙古圖志》等等。這些作者“時代相略銜接，相為師友，而流風所被，繼聲頗多。茲學遂成道光間顯學。”從而形成了一個邊疆史地的學術群體。而“邊徼地理之研究，大率由好學之謫臣或流寓發其

42) 《清高宗實錄》卷 490，乾隆二十年六月癸醜。（中華書局影印本，第15冊，164頁）

43) 孫喆《康雍乾隆時期輿圖繪製與疆域形成研究》，62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44) 於逢春《論中國疆域最終奠定的時間座標》，《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

45)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346-347頁，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

端。”⁴⁶⁾他們原本就有深厚的傳統史地學功底，現身處邊疆，更關注當地自然和人文，興起了對國家邊疆地區的關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列強勢力入侵中華，紛紛視吾為俎上之饈，覬覦其領土而斬割之。從中英《南京條約》，到中日《馬關條約》，竟有近二百萬平方公里之疆土為列強被所割占，為世界史上所罕見。這一系列事件，對中國朝野震動極大，士大夫階層懷著割地之痛，繼續研究邊疆史地之熱潮，出現大量研究邊疆史地的著作，代表作有何秋濤的《朔方備乘》、曹廷杰《東北邊防輯要》、《西伯利東偏紀要》、《東三省輿地圖說》等，均為考訂邊疆史地，以曹廷杰考訂“明永寧寺碑”為典型，反映了強烈保衛邊疆，抗拒侵略的願望和愛國主義精神，這時中國士人中現代國家疆域的概念完全形成。如龔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議》一文中，建議新疆地區建省，行與內地一樣的政區管理，認為此舉是“為天朝中外大疆開界處。”⁴⁷⁾又在《上國史館總裁提調總纂書》中建議在重修乾隆《大清一統志》時，將《西域圖志》、《平定羅剎方略》等資料補充進去，以補舊志的不足和遺漏。⁴⁸⁾這類邊疆內地化的思想，表示了晚清士大夫階級，對國家疆土近代觀念的逐步確立。

二是鴉片戰爭前夕，隨著西方傳教士的東來，一批西方地理學書籍開始傳入東南沿海城市，受到了一批意欲瞭解中國以外世界的中國士大夫階級的重視。鄒振環認為“道、咸年間，吸收和研究西方地理學的成果來撰寫世界地理的著作幾乎成了一個時代的風氣”，形成了“對於某一組問題的特定研究路線有共同信奉而聚集在一起的學術圈子”，稱之為“非體制化共同體。”⁴⁹⁾這批士人學者在瞭解世界地理的同時，對中國傳統國家、疆土、版圖的觀念又掀起一場重大的衝擊浪潮。如林則徐組織編譯了《四洲志》，以後又有魏源在《四洲志》基礎上整理、擴充的《海國圖志》和徐繼畲的《瀛環志略》的問世。梁啟超說：“此兩書在今日誠視為芻狗，然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識，實自此始。”⁵⁰⁾

徐繼畲《瀛環志略》和魏源《海國圖志》是我國近代最早向國人介紹西方世界地理知識的著作，《海國圖志》初版完成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為50卷，以後擴充為60卷，咸豐二年（1852年）增補為100卷。《瀛環志略》出版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十卷。其實這兩部書並非完全是今日概念的世界地理書，實際上還包括世界各國歷史沿革、疆域形勢、氣候物產、風土人情、

46)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347頁，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

47) 龔自珍《西域置行省議》：“大清國，堯以來所謂中國也。……我大清肇祖以來，宅長白之山，天以東海界大清最先。世祖入關，盡有唐堯以來南海，東南西北，設行省者十有八，方計二萬裏。古之有天下者，號稱有天下，尚未不能以有一海。……今聖朝既是全有東、南二海，又控制蒙古喀爾喀部落，於北不可謂險。今中國生齒日益繁，氣象日益隘，黃河日益為患，（下述社會矛盾尖銳，建議開發西域，內地向西域移民）……設兵部尚書、右都禦史、准回等處地方總督一員兵部侍郎、右副都禦史、准回等處地方巡撫一員……（在天山南北路設置府州縣，一律按內地之制）……應照內地江寧、荊州例，歲一閱，三歲總督一閱，十，勻請旨派威重大臣來西一大閱。布魯特、哈薩克之人鹹侍，是為天朝中外大疆開界處。”（《龔自珍全集》第一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111頁）

48) 《龔自珍全集》第五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312頁。

49) 鄒振環《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31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50)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349頁。

典章制度等等的史地並重的世界地理著作，其中《海國圖志》更是。這兩部書的出版，對當時社會起了極大轟動，尤其是在朝野知識界，通過兩部著作所繪製的世界各大洲的地圖，認識到原來中國傳統總認為中國是天下之中，周圍全是落後的四夷的觀念，以及對國家疆土領域的觀念是很落後的。原先“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王者不勤遠略，而德意所涵濡，威靈所震攝，類皆有囊括區夏，甄鑄埏埴之勢”的觀念，⁵¹⁾是如何的落後！如今看到世界原來有五大洲、四大洋，還有這麼多的國家，這些國家的歷史沿革和自然環境與中國如此不同，而中國不過是亞細亞洲東面的一部分，這對長期以來落後封閉的疆土觀念，展開了明亮的窗戶。《瀛環志略》卷一首先講述中國在亞洲之位置，其云：“亞細亞，……居是土者，為中國之十八省、東三省、內外蒙古諸部、新疆、回疆、青海、前後藏。其北際海，為俄羅斯之東境。其東濱海藩國，曰朝鮮。海中三島曰日本。又小島，曰琉球。其南與中國之滇、粵諸省毗連者，曰安南、暹羅、緬甸、南掌。散佈南海之中者，曰南洋群島。其西北與新疆、回疆毗連者，曰西域諸回部。其西與兩藏毗連者，曰廓爾喀，曰五印度。再西為阿富汗、俾路芝、波斯諸回部。再西南為阿剌伯回部。再西北為土耳其之東土。再西為土耳其之中土買諾，所謂小亞細亞者也。北距北冰海，東距大洋海，南距印度海，西距紅海、地中海、黑海，是為亞細業之全土。”⁵²⁾然後又講中國之版圖，《瀛環志略》中的《皇清一統輿地全圖》，就是一幅清代疆域圖，其對清代疆域的記述雲：《瀛環志略》卷一：“我朝幅員之廣，曠古未有。東三省之東北隅，地接俄羅斯。正北之內外蒙古諸部，悉其庭幕，編入八旗為臣僕。西南之青海、兩藏，置侯尉而安枕。西北之新疆、回疆，包《漢志》西域諸國之大半，而卡外之哈薩克、布魯特諸部，歲以牲畜供賦役。東海之朝鮮、琉球，南裔之交趾、暹羅、緬甸、南掌、廓爾喀諸國，修貢職無愆期。是亞細亞一土，未奉我正朔者，僅有東海之倭奴，北之俄羅斯，極西之弱小諸回部，南荒之印度諸國耳。則中國之在亞細亞，固不止得其半也。”⁵³⁾有學者認為：“徐繼畲最早向中國人士系統而全面地介紹了人類社會，特別是歐美早期近代化國家的社會變革和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經驗教訓。這對被隔絕了幾千年的中國人民來說，是頭一次獲得如此詳細而真實的海外知識，從而有了認識自己與世界的比較選擇的依據。”⁵⁴⁾

魏源《海國圖志》編撰的主旨略有不同，其原敘中說：“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作。”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失敗，給予魏源以極大的震動。國家政局的突變，萌發了他高昂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學習西方和“以夷制夷”的思想。《海國圖志》就是在這種抗擊外夷思想指導下產生的。要讓國人睜眼看世界，認識世界，認識自己，“善師四夷”，“師夷之長技”，經便“制夷”。故此書對中國周邊國家記述尤詳，特別重視海防之要，最附有西洋火炮、火輪、水雷及各種軍事器藝之說，充滿了保衛國家的愛國主義精神，並引《澳門新聞錄》曰：“中國人民，居天下三分之一，生齒之繁，無國可比。即如俄羅斯地方百四十一萬

51) 《瀛環志略》道光二十八年福山鹿澤長序，宋大川校注本，第7頁，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52) 宋大川校注本，第8頁，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53) 宋大川校注本，第2頁，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54) 劉天純《徐繼畲近代化》載《徐繼畲與東西文化交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142頁。

四千四百方裏，戶口不過四千一百九十二萬五千名。而中國只湖廣一省，廣不過十四萬四百七十方裏，已有戶口四千五百零二萬名；江南地方九萬二千九百方裏，戶口即有七千二百萬名。由此觀之，中國只一省，即可抵佛蘭西、英吉利、歐羅巴特裏阿三國之人民。又《華事夷言》曰：中國繁庶，甲乎四海。但廣東一省之人，可敵他方十餘國。各國皆地廣人稀，即印度戶口最稠，亦尙未有曠土。中國則不惟平地皆田，即山巔嶺側，無不層層開墾，寸壤不遺。其散佈於海外各國者，尙不知凡幾。其繁庶誠四海所未有。由是觀之，則東方之宜人，信矣。”⁵⁵⁾這種對祖國的自豪感，激發起廣大士大夫知識份子的愛國精神和民族國家的認同感。

到了晚清，對國家疆土、版圖已具備了現代民族國家的意識。19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周邊原為朝貢之國，都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西方列強欲蠶食我國領土，往往挑起邊界糾紛，有的公然武裝入侵，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強迫清廷訂立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如《中俄璦琿條約》、《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中英緬甸條約》、《中日馬關條約》等等，攫取中國大片領土，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最後雖然均以清朝退讓失敗告終。然這也強烈激起了了中國朝野的民族國家意識，民族國家疆土觀念已經完全確立。在邊界談判過程中，對邊界的勘查，界碑的設立，地圖的繪製，已十分認真，如光緒十二年吳大澂勘查咸豐八年《中俄璦琿條約》琿春與俄國交界地方有界限不清之處，重新立碑、製圖。⁵⁶⁾說明晚清官吏對國境邊界，已具備了現代意義國界的觀念。時晚清國家機構的改革，也是說明這個問題。如將第二次鴉片戰後與西方列強交涉“撫夷局”改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清末又改為外務部；邊疆地區設置行省的內地、邊疆的一體化等等舉措，都是現代民族國家意識的產物。又例如“版圖”一詞，到了晚清則又具有代表現代一個國家國民法定身份意義“國籍”的含義。同治元年協助清王朝鎮壓太平軍的美國人華爾，組織洋槍隊，1861年加入中國籍，史稱“願隸中國版圖，在上海隨同官軍。進攻嘉定太倉。”⁵⁷⁾以後華爾陣亡，美國人白齊文代之，也於1862年加入中國國籍，後因“白齊文不遵調遣，……該員已隸中國版圖，自應遵中國法律治罪，革去三品頂戴。”⁵⁸⁾這說明“版圖”已從傳統的版籍和土地含義中游離出來，發展成為國家法定主權的意義了。

四，小結

清代是我國歷史上最後完成中華民族國家的朝代。從康、雍、乾三代三大經濟區統一疆域的最後完成，到近代民族國家疆域觀念的確立，幾乎經歷了一個半世紀。這個過程是由內外兩種因素互相交織推動的。內因是各民族、各地區經歷了長期的交流和融合，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意識自然而然地萌生和形成，最後達到了共識；外因是與西方列強勢力的接觸和西方科學技術的引進，

55) 《海國圖志》卷74《國地總論上》，嶽麓書社，1998年版，下冊，1851頁。

56) 吳大澂《吉林勘界記》，《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一帙。

57) 《清穆宗實錄》卷40，同治元年閏八月甲午。（中華書局影印本，第45冊，1085頁）

58) 《清穆宗實錄》卷51，同治元年十二月辛巳。（中華書局影印本，第45冊，1294頁）

衝擊了數千年中國傳統的疆土意識，最後不得不放棄封閉落後的“天下觀”，融入世界政局的大潮流中去。按理而言，內因是主導因素，但在中國這樣一個特定封閉的地理環境而又有傳統強勢文化的國家，沒有外來更強勢力量的衝擊，其本身自然發展的動力是微弱的、進度是緩慢的。這幾乎與中國近代化的過程有同步之感。雖然中國國家意識萌發很早，但由於在亞洲東部最早崛起帝國周圍的民族在經濟、文化遠遠落後中華，除了朝貢臣服，沒有其他關係。故其疆界觀念沒有形成的條件。進入清代，整個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康熙帝又是我國歷史上具有科學頭腦而又有世界意識的皇帝，因此，《尼布楚條約》的簽訂，能對其產生很大的觸動。如果遇上一個顛頑昏庸的皇帝，那近代國家疆土觀念的萌生，恐怕還要遲上幾十年。

19世紀中葉以後，世界的格局已不允許大清帝國仍然沉睡在“天下之中”的美夢中，內外的各種因素不斷地刺激和推動著近代國家意識的產生，最後終於產生了具有近代國家意義的中華民國。